



從敦煌本《詩格》殘卷論唐代詩學對偶理論的實踐

鄭阿財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

摘要

律詩最為鮮明之表現在於聲律與對偶的講究。而律詩的成熟與發達也基於唐人詩學對詩歌作品聲律、對偶、句法與結構等要求。而大量《詩格》一類詩學『規範』著作的產生則是唐代詩歌創作普及的重要助力之一。

本文根據敦煌寫本 S.3011V 及 P.3353V 二件《詩格》殘卷，進行梳理、考述，藉以探究唐代《詩格》文獻與內容特徵，並結合敦煌、吐魯番及日本漢文學文獻等資料，觀察唐代學童學習詩之歷程，以及對偶理論在唐人詩歌實踐的實況。可見唐代律詩的成熟與普及，除了詩體發展的自然趨勢、帝王的提倡、科舉的影響等等原因外，《詩格》一類詩學著作對詩歌寫作之形式要求與技巧示範的流通，可說是另外的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敦煌寫本、唐代、詩格、唐代詩學、對偶。



On the Practice of the Parallelism Theory in Tang Poetics: A Study of the *Poetry Standards* (Shige) Fragments from Dunhuang

A-Tsai Cheng

Abstract

The regulated-verse poems focus on the sound regulations and the parallelism.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ulated-verse poems benefited from the sound regulations, the parallelism, and the grammar,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po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Many works on the poem standards appeared in the Tang period have encouraged the popularity of poem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fragments (S.3011v and P.3353v) of the *Poem Standards* (Shige) from Dunhua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extual and content features of the *Poem Standards* in the Tang. In addition, it also compares them with other materials from Dunhuang, Turfan, and Japan, and observes the experience of Tang children in learning how to compose poems and also to see how the Tang poets practiced the parallelism in their poe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Tang the maturity and popularity of the regulated-serve poems not only benefited from the natural trend of the poem genre,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s, but also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tyle requirements and



從敦煌本《詩格》殘卷論唐代詩學對偶理論的實踐

circulation of the *Poem Standards*.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ang , Shige, Tang Poetics , the parallelism .



一、前言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代表文學。中國文學史上談到一時代的代表文學時，總是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詩歌乃唐代文學之殊勝，詩歌發展到唐代，古詩、樂府、律詩、絕句，各體皆備，流派縱橫。其中，最能代表唐代詩歌的，首推律詩。

律詩最為鮮明之表現在於聲律與對偶的講究，而律詩的成熟與發達也基於唐人詩學對詩歌作品聲律、對偶、句法與結構等要求，又大量《詩格》一類詩學『規範』著作的產生則是唐代詩歌創作普及的重要助力之一。

1976 年余曾撰寫碩士論文《空海文鏡秘府論之研究》，因對唐代詩學有所涉獵，之後雖仍不斷關心蒐羅相關論著與新出資料，唯以全心全意致力於敦煌文獻之研究，致無暇繼續鑽研。2009 年台北大學舉辦『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要我擔任南開大學盧勝江教授論文〈《文鏡秘府論》卷次〉的特約討論人，會後承盧教授惠贈大作《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四大冊，並就敦煌文獻中有關唐人詩學資料進行交流；今值本系主辦『中國詩學理論學術研討會』，乃據尋檢所得英藏 S.3011V 及法藏 P.3353V 二殘卷，略作梳理、考述，藉以探究唐代《詩格》文獻與內容特徵，並結合敦煌、吐魯番及日本漢文學文獻等資料，論述對偶理論在唐代實踐之一斑。



二、唐代《詩格》的興起與現存概況

此所謂「詩格」，指的是「詩歌法式」一類的文學批評著作，包括以「詩格」、「詩式」、「詩法」等為名的論著。這一類的詩學著作在唐代最為風行，數量也多；既是唐代詩學論著的主要形式，也是唐代詩學理論的淵藪。

較早正視唐代《詩格》展開論述的是文學批評史研究者郭紹虞（1893-1984）與羅根澤（1900-1960）。郭紹虞在1934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除論述皎然《詩式》外，更立『論格論例之著』一節，概述中晚唐五代的詩文賦格作品，並就撰者、存佚、著錄等情況分別條列論述，以為此一時期《詩格》、《詩例》之作多屬依託之著，且「過涉瑣碎，轉成拘泥」¹。同年羅根澤也出版了《中國文學批評史》『漢魏六朝部分』，1943年修訂後，分冊出版到『晚唐五代部分』，其中《隋唐文學批評史》、《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分冊對各種《詩格》有更多的探究。他以為：「『詩格』有兩個盛興的時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²。

由於唐五代有關詩格文獻大多散失，雖然明本《吟窗雜錄》載有近三十種初唐至宋有關詩格、吟譜、句圖等詩學理論資料³，提供吾人豐富的研究文獻。

¹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第五編隋唐五代·第三章復古運動的銷沈時期」，『論格論例之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272-281。

² 1943年羅根澤出版有《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其中《隋唐文學批評史》、《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對各種《詩格》多所探究；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重印，將此四書合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分為上下冊；1961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將其未定稿兩宋部分加入，出版《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下三冊。本文援引均據中華書局版，以上見第五編《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二章〈詩格上〉、第三章〈詩格下〉，頁17-47。

³ 明刊《吟窗雜錄》，題名宋·陳應行輯。按：《吟窗雜錄》原本三十卷為南宋人編纂，假托北宋蔡傳之名；而五十卷為重編本，題名作陳應行。



然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來，頗以為其內容多依托偽作⁴，多少影響了後人對此批文獻之探究熱度。

在東鄰的日本，平安時期入唐求法高僧空海有《文鏡秘府論》六卷傳世。此書蓋為因應當時日本學習漢詩文之需求而編撰。其旨在論述平上去入、四聲八病之要；用韻換韻，種類用法之殊；起句落句，對偶病犯修辭之方。又論用字造句，定章謀篇為文之術；虛靜衛氣、命意率情構之法，亦皆道其中竅而示之以要，允為當時日本文章之手鑑，詩歌之津梁。更是日本詩文論之嚆矢，修辭學之開宗，其影響日本漢文學，可謂既深且遠。

按：詳審此書實非弘法大師空海所草創，而係其裒輯唐前諸家詩文格式，削複存單，添綴貫串而成。其所引用之詩文篇章，秘篇甚多，不可勝舉；而取材之詩文格式，亦每多見諸吾國史志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等，大多為今已亡佚者。如：隋·劉善經（約 610 年前後在世）《四聲指歸》，唐·杜正倫（575～658）《文筆要決》、上官儀（約 608-665）《筆札華梁》、崔融（653～706）《唐朝新定詩格》等。此外，也頗有今雖尚存，然內容多有異同者，

如：唐·王昌齡（698～756），《詩格》、釋皎然（720～798?）《詩議》等，是此類詩學著作端賴此書而得以存其梗概；或藉此書而得以窺其原貌。清·楊守敬（1839～1915）《日本訪書志》首次對《文鏡秘府論》古鈔本進行著錄，並

⁴ 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7「《吟窗雜錄》·五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提要云：「舊本題狀元陳應行編。前有紹興五年重陽後一日浩然子序。序末有嘉靖戊申孟夏崇文書堂家藏宋本刊字，蓋偽書也。前列諸家詩話，惟鍾嶸《詩品》為有據，而刪削失真。其餘如李嶠、王昌齡、皎然、賈島、齊己、白居易、李商隱，諸家之書，率出依託，鄙倍如出一手。而開卷魏文帝詩格一卷，乃盛論律詩。所引皆六朝以後之句，尤不足排斥。可謂心勞日拙者矣。」按：《吟窗雜錄》卷四至卷五所收的王昌齡《詩格》，其中或有真偽混雜；卷六題作《詩中密旨》內容，係淺薄之人雜抄元兢《詩髓腦》、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皎然《詩議》及佚名《詩式》內容拼湊而成。



介紹內容與價值⁵，之後，引發學界的關注，才有郭、羅等的援引論述。

特別是 1948 年日本小西甚一(1915~2007)《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考文篇⁶的先後問世，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豐富可靠的文本基礎，更激發了中日學者有關唐五代《詩格》的整理與研究。主要有潘重規師(1908~2003)〈隋劉善經四聲指歸小箋〉⁷、《文鏡秘府論研究發凡》⁸，王夢鷗(1907~2002)《初唐詩學著述考》⁹、王利器(1911~1998)《文鏡秘府論校注》¹⁰...，乃至近年張伯偉(1959~)《全唐五代詩格彙考》¹¹、盧盛江(1951~)《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¹²...等的出版。

總結前賢研究成果，可知唐五代詩格之作眾多，包括部分文格和賦格，約有六十餘種，其中雖有後世散佚，然今所得見仍不在少數，主要有：上官儀《筆札華梁》、佚名《文筆式》、魏文帝《詩格》、元兢《詩髓腦》、皎然《詩式》、皎然《詩議》、崔融《唐朝新定詩格》、李嶠《評詩格》、王昌齡《詩格》、王昌齡《詩中密旨》、白居易《金鍼詩格》、白居易《文苑詩格》、賈島《二南密旨》、

⁵ 楊守敬清光緒 23 年刊《日本訪書志》卷十三「《文鏡秘府論》六卷古鈔本」著錄云：「此書蓋為詩文聲病而作，彙集沈隱侯、劉善經、劉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說。今傳世唯皎然之書，餘皆泯滅。按《宋書》雖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說，近代已不得其詳。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種病，皆一一引詩，證佐分明。」(台北：廣文書局，1967 年)，頁一。

⁶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京都：大八洲出版，1948 年)；《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1 年 3 月)。《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3 年 8 月)。

⁷ 潘重規：〈隋劉善經四聲指歸小箋〉，《中國學報》一卷四期，(1945 年 8 月)，頁 3-10。隋劉善經四聲指歸定本箋 新亞學術年刊九期 1962.09

⁸ 潘重規：〈文鏡秘府論研究發凡〉，《中日文化論集》(一)，1955 年 4 月。

⁹ 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¹⁰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

¹¹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¹² 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



王叡《炙轂子詩格》、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鄭谷等撰《新定詩格》、僧齊己《風騷旨格》、僧虛中《流類手鑑》、徐夔《雅道機要》、徐衍《風騷要式》、王玄《詩中旨格》、王夢簡《詩格要律》、僧神或《詩格》、僧保暹《處囊訣》、僧景淳《詩評》…等。足見唐人詩學有關格法問題確實風行一時且著述宏富¹³。又此類詩學論著中以『詩格』為名者眾多，可見「詩格」是唐代詩學中，講究詩的法式規則一類著作的專有名詞，此類著作無疑是唐代詩學的核心。

三、敦煌文獻《詩格》殘卷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今編17號窟）偶然發現為數近六萬件北宋以前的寫本文獻。這些寫卷就內容論，種類繁多，內容龐雜，舉凡：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社會、科技…等等，諸多面向；就文獻內容反應的空間論，具中央地方並存，西域中原同在的特性；就反應的社會階層論，王室、貴族、文士、官吏、僧人、庶民、學郎等，所在多有。抄寫時代以唐五代為主，其特色蓋在不為流傳而流傳，因而最能反映實際生活面貌，可說時唐五代社會生活的活化石。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王國，詩歌創作法式規的講究，是造就此一輝煌盛況的助力之一。「詩格」著作既此類核心著作，風行全唐，普及各地。凡有作詩、習詩之處，多有可能流傳。

敦煌雖地處西北邊陲，然從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敦煌成為唐朝治域開始，到貞元二年（786）被吐蕃佔領，這段為期160多年的期間，是敦煌歷史

¹³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考及全唐五代各類詩格著述三十一種，另有詩格存目二十一種。



上所調的「盛唐時期」，也是敦煌的全盛時期。此一時期正值大唐國力鼎盛，絲路全線暢通；敦煌衣冠文物制度與中原無別，長安與西域文明也在此薈萃。

中唐之後，吐蕃佔領敦煌時期（786～848），敦煌與中原地區短暫脫節。大中二年（848）張義潮起義成功，唐朝受張氏歸義軍節度使，敦煌進入歸義軍時期。此時期敦煌傳承漢族文化，重建唐朝制度，恢復教育體制。敦煌地區詩歌創作的風氣不斷。從張錫厚主編的《全敦煌詩》¹⁴校輯有各體類作品 20000 多首，去其重複，得 4500 首，可以窺知。

而今存敦煌文獻中也有保存有時人詩抄、習詩…等寫本，詳檢今所公佈敦煌寫本，有關《詩格》的文獻計得二件，分別為：S.3011 及 P.3353V。茲分別將此寫卷概要敘錄如下，以資參考。

（一）寫卷敘錄

1. 英藏 S.3011 號

卷子本，中間斷裂，散失一段，今存頭尾兩段，分作 A、B 二件。S.3011A 高 28 公分，長 150 公分，依內容為前段；S.3011B，高 28 公分，長 300 公分，依內容屬後段。

S.3011A，正背書。正面：《論語集解》卷六，首尾俱缺，存 84 行。

起：「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¹⁴ 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北京市：作家出版社，2006 年）。此書於敦煌詩歌採取廣義概念。除傳統詩歌外，還將佛曲、俗曲、俚詞等所謂「曲詞類」，邈真贊等所謂「偈贊類」作品，涵蓋在「全敦煌詩」的冒頭下，故作品數量劇增。



迄：「上缺駟不及舌」《集解》「駟馬追之不及」。

背面：有「短短短」「伯盈」、「索員住」等雜寫。後接抄《詩格一部》片段，四行，謹依行款逐錄如下：

1. 詩格一部
2. 弟一的名對。弟二隔句對。弟三雙擬對。弟四聯
3. 綿對。弟五互成對。弟六異類對。弟七賦體對。
4. 弟一的名對。上句

接著有：倒書一行：「北方大聖大王卜手□□」，之後「詩格一部」二行習書（倒書），全文如下：

1. 詩格一部、弟一的名對。
2. 詩一格部天青白雲外、山俊（峻）紫微中。鳥飛誰（隨）影去，花落（落）逐遙（搖）風。



2. 法藏 P.3353

卷子本，正背書。正面：《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卷四》，首尾具缺，存 80 行。起：「上缺清眾聖□證道真下缺」

迄：「上缺玉女四司五帝五斗監司建節持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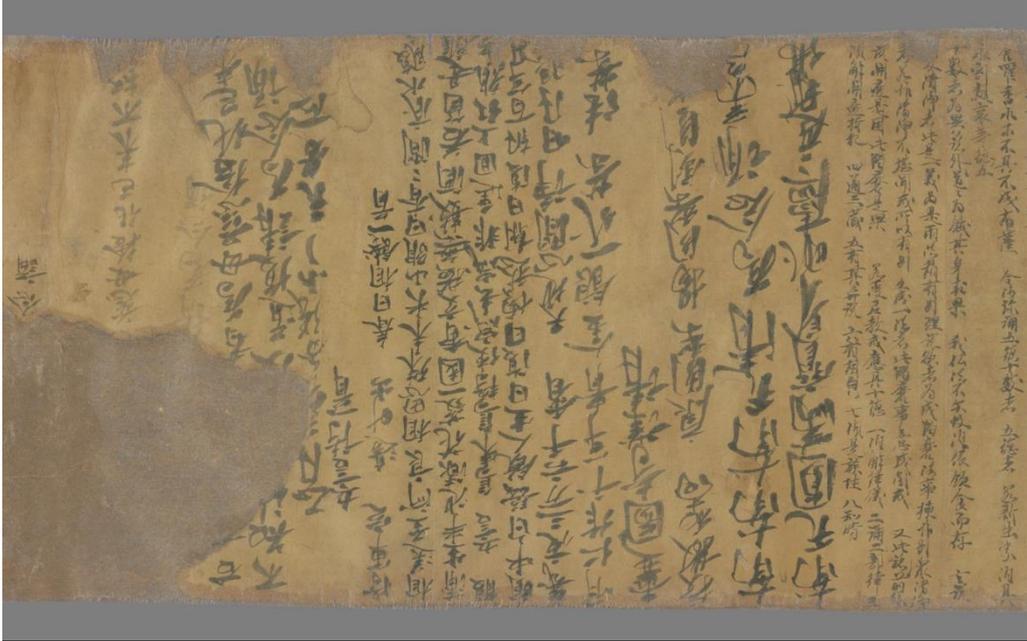
背面分抄：佛經戒律疏釋、靈圖寺謹請（倒書四行）、施捨書數件（倒書）、詩抄（倒書）、慈母捨化以來念誦（倒書六行）。

詩抄倒書八行，全文如下：

1. 五詩言一首
2. 將軍定邊計，出下缺 春日相餞一首
3. 相送至河良（梁），相思殊未央。山頭日杳杳，澗底水颺颺。
4. 蒲生半池淥，花發一園香。交橫無數酒，若個是離
5. 觴。 五言 鳥來鳥轉使，歲來歲非遙。回（面）上紅顏色，
6. 頭中白髮饒。人生日復日，懷愁朝復朝。百年凡
7. 幾夜，三萬六千霄（宵）。〔缺題〕天地心間淨，日月眼中



8. 明。仁作千年貴，金銀一代榮。法榮。



(二) 敦煌本《詩格》殘卷的內容考

S.3011A 背面抄寫有關《詩格》殘卷的內容，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校錄其詩句「天青白雲外、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於校記中提及：

原鈔《論語集解》卷六、七背，倒書四段：「詩格一部：第一的名對，第二隔句對，第三雙擬對，第四聯綿對，第五互成對，第六異類對，第七賦體對。」…按此處所存「七對」名目，與《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的前七對完全一致…《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第六異類對云：「異類對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詩曰：『天青白雲外、



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¹⁵。

徐氏雖以輯錄敦煌詩集殘卷為主，然對 S.3011 有關《詩格》殘卷「七對名目」也明白的指出其與《文鏡秘府論》之對應關係；之後，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詩格》佚名撰」條下，對 S.3011《詩格》殘卷全文進行校錄，解題中更明確的對此殘卷內容、名目、次第、詩句，詳為比對¹⁶。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敦煌本《詩格》為唐代盛行的詩學論著，由於唐代以《詩格》為名之詩學論著眾多，除今傳題為魏文帝、王昌齡等《詩格》多種外，後世亡佚而見於史志目錄著錄的還有：元兢《沈約詩格》、王維《詩格》、徐隱泰《開元詩格》、王起《大中新行詩格》、徐銳《詩格》、佚名《杜氏詩律詩格》…等。敦煌本《詩格》究竟為何人的著作？由於殘存內容太少，所以難以確切考知；只能確定其殘存的內容七種對偶名目及部分例句，見於空海《文鏡秘府論》的「二十九種對」中，且與署名魏文帝《詩格》，及所謂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多同。茲對照表列如下，以資參考。

¹⁵ 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874。

¹⁶ 參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現存較完整者三行乃“七對”名目，此外有詩四句。此斷片雖為殘文，但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七對之名目、順序與《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前七對完全一致，可證其為時人之通說，亦可為空海“古人同出斯對”之語作一旁證；其二，此三行殘文從字跡來看，幼稚拙劣，顯然出於學郎所書。而習書以《詩格》為內容，亦從一個側面透露了唐代《詩格》類書在民間頗為流行之消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110。



敦煌本《詩格》殘卷	上官儀《筆札華梁》	《文筆式》	魏文帝《詩格》
<p>詩格一部</p> <p>第一的名對，第二隔句對，第三雙擬對，第四聯綿對，第五互成對，第六異類對，第七賦體對。…</p> <p>天青白雲外、山俊（峻）紫微中。鳥飛誰（隨）影去，花洛（落）逐遙（搖）風。</p> <p>（S.3011A 卷背）</p> <p>天地心間淨，日月眼中明。仁作千年貴，金銀一代榮。法榮</p> <p>（P.3353 卷背）</p>	<p>屬對</p> <p>第一，的名對。…</p> <p>第二，隔句對。…</p> <p>第三，雙擬對。…</p> <p>第四，聯綿對。…</p> <p>第五，異類對。…</p> <p>鳥飛隨去影，花落逐搖風…</p> <p>第六，雙聲對。…</p> <p>第七，疊韻對。…</p> <p>第八，回文對。…</p> <p>第九，同類對。…</p> <p>（以上見《文鏡秘府論》東卷）</p>	<p>屬對</p> <p>第一，的名對。…</p> <p>……</p> <p>第五，互成對。…詩曰：天地心間靜，日月眼中明。麟鳳千年貴，金銀一代榮。</p> <p>第六，異類對。…詩曰：天青白雲外、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p> <p>……</p> <p>第十三，總不對對。…</p> <p>（以上見《文鏡秘府論》）</p>	<p>八對</p> <p>一曰正名，二曰隔句，三曰雙聲，四曰疊韻，五曰連綿，六曰異類，七曰迴文，八曰雙擬。</p> <p>正名一，…</p> <p>隔句二，…</p> <p>雙聲三，…</p> <p>疊韻四，…</p> <p>連綿五，…</p> <p>異類六，古詩：鳥飛隨去影，花落逐搖風…</p> <p>迴文七，…</p> <p>雙擬八。…</p> <p>（以上見《吟窗雜錄》）</p>

按：唐初宮庭詩人上官儀（608～665）繼承齊梁宮體詩，除寫出人稱上官體具有「綺錯婉媚」詩風的作品外，還將六朝以來作詩講究對偶，加以歸納而提出程式化的對偶名目，對唐代律詩形式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促進的作用。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云：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風秋池是也。



又曰：

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詩苑類格》）

17

宋·李淑（1027 前後在世）《詩苑類格》所說上官儀「六對」、「八對」，實出自上官儀《筆札華梁》中「六對」、「八對」詳見空海《文鏡秘府論》。

敦煌本 S.3011《詩格》殘卷內容提及的對偶名目有七，除「第七賦體對」外，其他六種均見上官儀「八對」；「賦體對」見於《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二十九種對』的「第七賦體對」。不但如此，且所存七種對之次第、名目均同。此外，S.3011 抄寫《詩格》的例句有「天青白雲外、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詩句亦見於《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二十九種對』的「第六異類對」下¹⁸所引的上官儀《筆札華梁》中。儘管如此，雖敦煌寫卷 S.3011A，明白題名《詩格》一部，是知其內容當非引自上官儀《筆札華梁》。

考唐代詩學論著中題名有《詩格》者，有：魏文帝《詩格》、崔融《唐朝新定詩格》、李嶠《評詩格》、王昌齡《詩格》、白居易《金鍼詩格》、白居易《文

¹⁷ 宋·蘇慶之《詩人玉屑》卷七「屬對」下『六對』條（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65-166。

¹⁸ 《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二十九種對』，「第六異類對」：「第六異類對，…詩曰：天清白雲外，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



苑詩格》、王叡《炙轂子詩格》、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鄭谷等撰《新定詩格》、僧神或《詩格》。從書名論，敦煌本 S.3011A《詩格》有可能是某一《某某詩格》的省稱；更可能書名就是《詩格》。衡之以內容，王昌齡《詩格》¹⁹、僧神或《詩格》所論蓋為「調聲」、「十七勢」、「六義」、「論文意」、「十四體」…等，不及對偶名目，是知此二書與 S.3011A，只是同名為《詩格》而已。

至於今傳署名魏文帝《詩格》，內容計有：「句例」、「對例」、「六志」、「八對」、「八病」、「雜例」、「頭尾不對例」、「俱不對例」等八目，其中「八對」名目與敦煌本同者，且敦煌本原引詩例亦見於署名魏文帝《詩格》的「八對」中。然今傳署名魏文帝《詩格》內容除「雜例」外，均見於《文鏡秘府論》所引的上官儀《筆札華梁》及佚名的《文筆式》中。魏文帝《詩格》顯然為唐人「雜取散佚文字，拼湊成帙」偽託為魏文帝之作²⁰，猶如元兢《沈約詩格》，可見唐人詩學論著此類依托偽作至夥，凸顯了此時講究詩律、對偶、句法規範詩學之流風。誠如空海《文鏡秘府論》東卷「論對」『二十九種對』下所言：「古人同出斯對」。對偶名目相因，內容、書名相襲，為此類詩學流風之特色。因此，只能說署名魏文帝《詩格》與敦煌寫本 S.3011A《詩格》乃性質相似的同名異書。又 S.3011A 寫卷題名「《詩格》一部」，既以「部」為量詞，稱「一部」，顯然不是一卷。此也可說明二者非一。

¹⁹ 王昌齡《詩格》，今傳世計有二種：一為《文鏡秘府論》徵引部分；學界以為此部分當出於王氏之作；一為明刊《吟窗雜錄》所收王昌齡《詩格》，其中真偽混雜。

²⁰ 署名魏文帝《詩格》，最早收錄於《吟窗雜錄》卷一。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詩格》一卷，題魏文帝。所述詩或在沈約後，其為假託明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64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吟窗雜錄》提要：「開卷魏文帝《詩格》一卷，乃論率詩，所引皆六朝以後之具，尤不足排斥，可謂心勞日拙者矣。」（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239。



(三) 敦煌本《詩格》殘卷的抄寫年代

關於 S.3011 及 P.3353 二件《詩格》殘卷的抄寫年代，並無具體的題記年代可資證明。張伯偉從內容上推斷，以為敦煌本《詩格》的編撰年代應該屬初、盛唐之間。而 S.3011《論語集解》首題前卷六、卷七間有題記：「戊寅年十一月六日，僧馬永隆手寫《論語》一卷之耳。」其「戊寅年」，徐俊擬為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²¹，池田溫擬為後梁貞明四年(918)²²。張伯偉又據姜亮夫《敦煌碎金·導言》「款式問題」，以為 S.3011、P.3353 二件均有倒書，此種現象「從書寫款式來看，其中有將紙倒轉倒書之現象。在敦煌寫卷中，此類現象多出現于中唐前，至中唐便少見，唐末張議潮後便絕跡」因而推斷此二件《詩格》殘卷的抄寫年代不會晚至五代時期。²³

余意以為就內容論，S.3011 及 P.3353 二件《詩格》殘卷著作時代推測，屬初、盛唐之間，又推斷此二件《詩格》殘卷的抄寫年代不會晚至五代時期，大抵合理。只是援引姜亮夫「款式問題」說法似有所誤解，有待商榷²⁴。按：《敦煌碎金》所言乃指「(敦煌卷子)若字抄錯，中唐前往往往將紙倒轉而倒抄下，至中唐，此類情況便少見，至唐末張議潮後，便不再倒寫，如有錯字輒塗劃了之。」指的是抄寫錯誤時的補救方法，而非指倒書現象的流行。再者，衡之以敦煌寫卷所見的倒書現象，主要不是出現在中唐前，而是以吐蕃佔領時

²¹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875。

²²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月)，頁457。

²³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110。

²⁴ 《敦煌碎金》「款式問題」：「敦煌卷子用紙大小基本一致，約當一尺餘(三十公分稍多)。大體每紙書寫十九至二十行，共十七至二十一字之間。小注亦占一字格。若遇注文較多，則一字格書寫二至三字之注文。若字抄錯，中唐前往往往將紙倒轉而倒抄下，至中唐，此類情況便少見，至唐末張議潮後，便不再倒寫，如有錯字輒塗劃了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7。



期與歸義軍時期為多。蓋以其時敦煌地區與中原脫節，中原圖書、紙張不易輸入，以致紙張寶貴。此期間民眾、寺僧多利用寫卷背面及空白處來抄寫，尤其以學郎習書，或僧人雜寫為多。背面書寫時，直接將卷子翻轉，故每每出現倒書情形，所以出現倒書情形之寫卷實以中唐之後，也就是吐蕃時期及歸義軍時期為多。例如：S.3393《王梵志詩》，卷背有社司轉帖（正倒雜抄）、《去三害賦》（倒書）；Px.2430「出家讚」後有倒書一行「三十三天佛最尊，萬物終歸不過人，一」。…等等均是。

至於 S.3011B《論語集解》題記有：「戊寅年」，按唐代「戊寅年」計有：武德元年（618）、儀鳳三年（678）、開元二十六年（738）、貞元十四年（798）、大中十二年（858）；五代時期後梁貞明四年（918）。此「戊寅年」究竟為哪一年？英國翟理斯以為 858 年²⁵；池田溫斷為 918 年。

敦煌「金光明寺」寺名最早出現在敦煌寫卷 S.2729，時為吐蕃統治時期辰年（788），據《天禧塔記》所載北宋天禧三年（1019）寺猶存。寺址在沙洲城西，九世紀中期至十世紀二十年代設有寺學（S.3011、P.3692）²⁶。則此「戊寅年」指 858 年或 918 年均有可能。

按：敦煌寫本題記紀年，不用年號而以干支紀年的主要從吐蕃時期開始，特別是以地支紀年；雖然主要屬於吐蕃時期，但仍延伸到張氏歸義軍時期²⁷。其中，歸義軍時期傳承漢文化，恢復大唐教育制度，《論語》成為主要教材，

²⁵ 翟理斯（Lionel Giles）《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倫敦，1957 年），頁 232。

²⁶ 李正宇「金光明寺」條，見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630。

²⁷ 參張秀清《敦煌寫經紀年研究》，《新西部》2010 年 8 期，頁 124。



一時抄本蠡出，據今所得見有紀年之寫本，以羅振玉舊藏大中五年(851 年，辛未歲)為最早，而出現年代均很集中²⁸，都在九世紀後半葉。是 S.3011B《論語集解》題記的「戊寅年」當以大中十二年(858)的說法較為合理。

又 S.3011B《論語集解》首題前卷六、卷七間有題記：「戊寅年十一月六日，僧馬永隆手寫《論語》一卷之耳」與《論語集解》字體不一，也與卷背《詩格》殘卷字跡不同，顯然並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不過其抄寫時代大抵相距不遠。總體而論，《詩格》殘卷的抄寫年代當在九世紀中後期，也就是歸義軍初期，不會晚至十世紀的五代時期。

四、唐五代學童詩歌的學習與對偶論的實踐

(一) 唐五代學童詩歌的學習

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詩歌的王國。據《全唐詩》九百卷所載，總計有作家二千二百餘家，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²⁹。明·胡應麟《詩藪外編》曾從詩歌的體式、風調與作者普遍等方面來論述唐詩興盛的情形，他說：「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縉衣羽客，靡弗預矣。」³⁰可見唐詩人才之盛，作品之夥，流行之普及，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唐代詩風之所以如此興盛，除了詩歌本身發展的文學規律外，科舉考試

²⁸ 例如：P.2604 大中七年(853)、P.3441a 大中七年(853)、P.2716 大中九年(855)、P.3745 咸通三年(862)、P.2716 咸通五年(864)、P.2681+2618 乾符三年(876)、P.3271 乾符四年(877)…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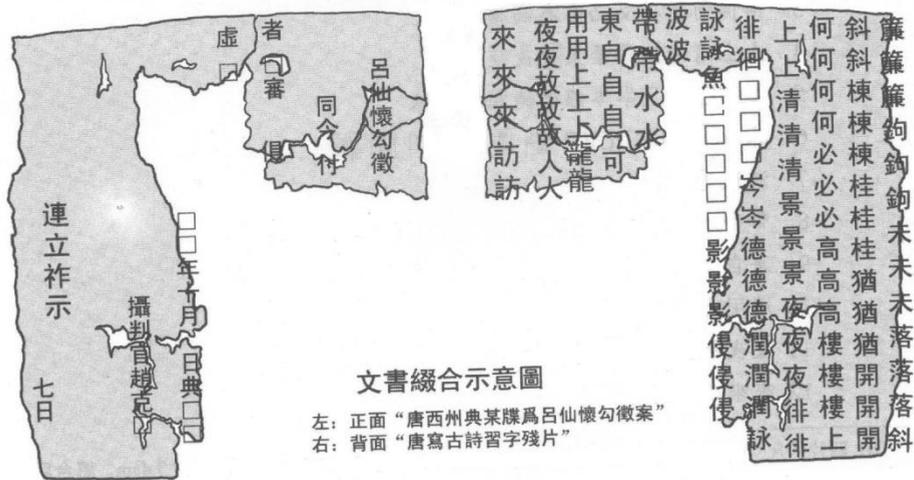
²⁹ 《全唐詩》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等奉敕編校，共計 900 卷，目錄 12 卷。「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

³⁰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唐上」(台北：正生書局，1973年5月)，頁 157。



以詩賦取士，也是促進唐詩發達普及的另一主要因素。我們在欣賞詩歌讚嘆大唐詩歌輝煌的同時，不禁也會思索，學童稚子的詩歌創作，是如何培訓養成的？而科舉考試下的學子們又是如何透過詩歌規範的學習來確保詩作合乎考試之基本要求。這些習詩過程與相關材料，傳世載籍大都未見載錄與流傳。因此，儘管唐代詩風盛極一時，然而後世對唐時學童、舉子習詩之實況卻均不甚明瞭。

近年發現的吐魯番文獻中有編號 2006TZJI:006 及 2006TZJI:007 兩殘片組成的一件文書。其正面是一件西州官文書的最後署名部分；背面則是高昌國或唐西州時期的習字殘片，是一首五言古詩：「□簾鉤未落，斜棟桂猶開。何必高樓上，清景夜徘徊。」與編號為 2006TZJI:073、2006TZJI:074) 可以綴合。



對於這件以詩歌作為習字範本的文書，朱玉麒曾撰文論述其在文學史的意義說：

用古詩作為習字用帖反復臨寫，卻充分表明了一個時代新的風尚，那就是對詩歌的愛好，成為童蒙學習的日常形態。³¹

這件吐魯番文書雖為殘片，然卻有助於我們瞭解唐代學童日常學習詩歌寫作的具體實況。而與吐魯番地區地緣相鄰，時代相續的敦煌文獻，也保有較多的相關材料。

在敦煌寫卷中頗多唐五代寺學學郎遺留下來讀誦、抄習詩歌的材料，提供研究唐代詩歌流通實況的珍貴材料。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³²曾從 28 件敦煌寫卷中輯得 54 首（含殘句）當時學生隨手抄寫的詩篇，讓我們得以一睹千年前敦煌地區學郎即興抒懷的詩作。這些詩篇遠不如詩家名篇，也非嘔心瀝血之作，但卻是最為真實自然的學堂之聲，是最能反映當時學郎心境的詩歌。這些作品的整理與研究，既能豐富唐五代兒童詩歌的作品，又可印證唐詩發達普及盛況空前的歷史事實。

唐初近體詩創作趨於繁榮，其表現逐漸形成固定程式，特別是詠物詩，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描寫程式。武周時期李嶠有詠物詩集《雜詠》，又稱《百詠》，或名《百二十詠》。此一詩集，是一部以五言律詩撰寫的「作詩入門」類書³³。

³¹ 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研究》，原載《文物》2007 年第 2 期，修訂本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榮新江等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521-529 頁。

³² 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8，（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07 年 2 月），頁 111-138。後收錄於《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30。

³³ 李嶠《百詠》雖為五言律詩，然按類編排，實具類書特質。因此，王三慶《敦煌類書》「詩篇體之類書」收入 S.555V、P.3738《李嶠雜詠·張庭芳注本》殘卷。（高雄：麗文文化公司，



內容分題歌詠：日月星辰、風雲月露、香草美樹、奇鳥吉獸、琴棋書畫等，幾乎涵蓋所有自然事物及人文器具。是唐初以來探究對偶、聲律之風的產物。此書東傳日本，至為流行，是日本學習漢詩的入門讀本。傳本、注本不絕。日本著名漢文學史研究者川口久雄將李嶠《百詠》與白居易詩、李翰《蒙求》稱為日本平安時代知識階級三大幼學啟蒙書。³⁴葛曉音以為：「(李嶠《百詠》)既然傳到日本，在唐代也必定流傳甚廣。而且在天寶六年又有張庭芳為之作注，…欲啟諸童稚焉。顯然，張庭芳是把這組詩視為一種創作範式來作注，並兼給童稚啟蒙的。可見『百詠』在盛唐仍有促進詩歌普及的作用。」³⁵

李嶠《雜詠》以五言律詩的形式，系統的分題詠物來作為詩歌啟蒙的創作範式，顯然是受到唐初以來詩學論著專講對偶、聲律的影響。這類論著曾被空海《文鏡秘府論》加以裒集貫串，作為日人學習漢詩文之指導書籍。按：初唐以來此類詩學論著，所論蓋以平仄聲律、對偶、句法等詩歌形式為主要內容，尤其以講究常用形式規範與例句為其特點。

李嶠《雜詠》與此類詩學論著雖然採取的形式不同，然而講究聲律、對偶、用典等詩歌創作的基本要求實無二至。只是李嶠《雜詠》總結了在他之前聲律、對偶發展的成果。一百二十首篇篇主題不同，章法各異，採用具體詩作來作為詩歌寫作的具體示範，匠心獨具，允為實用之詩歌寫作方法大全，其於初學尤具效用。因此，不僅盛行於大唐，同時有無注本及注本的流傳，平安時期注本更東傳日本，而成為日人學習漢詩的表記，深受搢紳之士所喜好。其在西

1993年6月)，頁121、543~546。

³⁴ 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第二十四章第六節「源光行の蒙求・百詠・樂府和歌」，（東京：明治書院，1961年3月），985~994。

³⁵ 葛曉音：〈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載《文學遺產》1995：6，後收入《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35~251。



陲的敦煌地區，也同樣普遍流傳，成為舉子、學郎學習詩歌規撫之典範。今敦煌文獻中保存有關李嶠《雜詠》唐·張庭芳注本，計有：S.555、P.3738、 $\text{D}x.10298+$ $\text{D}x.5898+$ $\text{D}x.2999+$ $\text{D}x.3058+$ $\text{D}x.11210$ 等寫本。日本更有大量無注本及注本的流傳與刊刻。³⁶鎌倉(1192~1333)初期學者源光行據李嶠《雜詠》翻作《百詠和歌》，其序云：「張庭芳追述數千言之注，以備於後鑒。」敦煌本與日本藏本的保存，印證了李嶠《雜詠》(《百二十詠》)在當時確實用來作為學郎、舉子詩歌習作養成的基礎教材。

另外，敦煌本 S.3011 及 P.3353 二件《詩格》殘卷，內容確為唐人《詩格》無疑，雖僅殘存幾行，內容相當有限，且都見於傳世文獻中，雖於唐人詩學理論之研究無甚助益，然其抄寫情況，卻可印證對偶理論在唐人詩歌習作歷程中的實踐。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詩格》佚名撰」條下，指出 S.3011《詩格》殘卷值得注意的兩點，即：可證「對偶說」為時人之通說，可為空海「古人同出斯對」之語作一旁證；又殘卷字跡，幼稚拙劣，當為學郎所書，據此可見唐《詩格》類書在民間頗流行之一斑。³⁷

詳審敦煌本 S.3011B《詩格》殘卷，同卷後有倒書「千字文敕員外」、「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多次。觀其筆跡當出自同一人所抄。其中「得人一牛，還

³⁶ 參福田俊昭：《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2月）。

³⁷ 參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現存較完整者三行乃“七對”名目，此外有詩四句。此斷片雖為殘文，但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七對之名目、順序與《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前七對完全一致，可證其為時人之通說，亦可為空海“古人同出斯對”之語作一旁證；其二，此三行殘文從字跡來看，幼稚拙劣，顯然出於學郎所書。而習書以《詩格》為內容，亦從一個側面透露了唐代《詩格》類書在民間頗為流行之消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110。



人一馬」蓋出自《太公家教》³⁸。按：《千字文》、《太公家教》乃唐代盛行的蒙書，為唐五代敦煌普遍流行的寺學教材³⁹。從這些雜寫合抄的情況可以推斷此寫卷的抄寫者顯然為當時的學郎；而寫卷的性質當屬學郎之習書。綜上而論，我們似可推知《詩格》既流傳於敦煌地區，且為學郎習詩之基礎。其內容講究對偶，並標舉對偶名目，是唐五代敦煌地區學童學習詩歌寫作的重要內容。據此寫卷可反映出唐五代敦煌地區學子透過《詩格》一類來進行詩歌習作的實況。

（二）唐五代詩學中對偶理論的發展與實踐

「格」在唐人詩學論著的使用，大抵有三方面：一是指詩歌創作的格式、體制，這是「詩格」最初的命名取義；其次是指詩歌的用意、取象、定體等技巧或規律，這是唐代詩學發展中期「詩格」論著的主要內容；第三則是指品格，格調，主要討論詩歌作品審美的特徵，這是唐代詩學後期到宋代詩學最常論述的內容。

唐代詩學論著初期使用的「格」，意思大都指法式；標準：規格，內容主要在討論詩歌的體制、格式方面等的問題。具體的說，就是指聲律、屬對、句式等詩歌創作的規範。這些都是詩歌的形式要素，也是促進唐代近體詩成熟的重要力量。而以「詩格」來作為詩學論著的命名，蓋期以作為詩歌寫作規範自許。此類著作之編寫動機，大抵在供作初學入門之用；或為應舉詩歌考試之便。因此，對偶論自然是此類論著的重要內容之一。

所謂對偶，即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的排列。蓋以中國漢

³⁸ 見周鳳五《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5月），頁11。

³⁹ 參鄭阿財、朱鳳玉合著《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字，一字一音、一音一義，故宜對偶。六朝以來，文學以藻飾相高；詩文對偶的追求，益趨普遍。沈約「八聲四病」之說出，究論平仄，而使對偶的運用，更趨工整。梁·湘東王蕭繹更有言：「作詩不對，本是吼文，不名為詩。」⁴⁰說明此時講求對偶已成詩歌寫作的必要條件。六朝以下，詩文皆務對偶，體式勃興，集齊梁以前文論之中國文學理論鉅著《文心雕龍》立有〈麗辭〉一篇，其中便有四對之分，唐初上官儀因之而創六對、八對之說，其後分之愈細。《文鏡秘府論》東卷則更分為二十九對⁴¹，雖其說或嫌瑣碎，然除義對外，覃及形對、聲對，實對偶說之極致也。⁴²空海既承六朝聲律對偶之影響，又深受大唐詩風之熏染，除為文特重對偶外，所撰《文鏡秘府論》一書，除可呈現空海承舍人之旨而有所闡發，尤多當時所見唐人「論對」論著之遺存。

如前所論李嶠《雜詠》以五律形式的詠物組詩作為詩歌啟蒙的創作範式，其用對的情形也彰顯了唐初以來對偶論詩學的具體實踐。如「乾象詩十首」，〈日〉：「日出扶桑路，遙昇若木枝。雲間五色滿，霞際九光披。東陸蒼龍駕，南郊赤羽馳。傾心比葵藿，朝夕奉堯曦。」「雲間」與「霞際」，「東陸」對「南郊」為『同類對』；「五色滿」與「九光披」為『平對』；「蒼龍駕」與「赤羽馳」為『異類對』。⁴³此外，又如：「皎潔臨疏牖，玲瓏鑒薄帷。」（〈月〉）中的「皎

⁴⁰ 見《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引梁朝湘東王《詩評》。

⁴¹ 即：一曰的名對；（亦名正名對，亦名正對。）二曰隔句對；三曰雙擬對；四曰聯綿對；五曰互成對；六曰約異類對；七曰賦體對；八曰雙聲對；九曰疊韻類；十曰迴文類；十一曰意對；十二曰平對；十三曰奇對；十四曰同對；十五曰字對；十六曰聲對；十七曰側對；十八曰鄰近對；十九曰交絡對；二十曰當句對；二十一曰含境對；二十二曰背體對；二十三曰偏對；二十四曰雙虛實對；二十五曰假對；二十六曰切側對；二十七曰雙聲側對；二十八曰疊韻側對；二十九曰總不對對。

⁴² 參鄭阿財：《空海文鏡秘府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76年），頁162-164。

⁴³ 《吟窗雜錄》收有「舊題唐·李嶠撰《評詩格》」，開頭「詩有九對」下有：「一曰切對。二曰切側對。三曰字對。四曰字側對。五曰聲對。六曰雙聲對。七曰雙聲側對。八曰疊韻對。九曰疊韻側對。」雖屬依托，顯見李嶠於詩甚重對偶，此蓋為初唐詩學之風。



潔」與「玲瓏」；「參差橫風翼，搜索動人心。」（〈蕭〉）中的「參差」與「搜索」均屬『雙聲對』，亦即上句二字與下句對句，二字各自為雙聲。又如「羅將翡翠合，錦逐鳳皇舒。」（〈帷〉）中的「翡翠」與「鳳皇」，「燦爛金輿側，玲瓏玉殿隈。」（〈珠〉）中的「燦爛」與「玲瓏」，上下對句，均係連綿詞，屬『連綿詞對』。又如：「倘入非熊兆，寧思玄豹情。」（〈霧〉）中的「非」與「玄」，「丹風棲金轄，非熊載寶軒。」（〈車〉）中的「丹」與「非」各自相對，其中「非」與「緋」音同，借為表粉紅色之「緋」，因而與「玄」、「丹」構成聲對，亦即不問字義的『借音對』。「烏鵲填應滿，黃光去不歸。」（〈橋〉）「烏鵲」是禽鳥，「黃光」是人名，因界「黃」的字義既為姓氏，又為顏色。此處借「黃」字面表字義與「烏」字構成顏色對句，此屬利用字詞的多義性，不取其在本句中的意義，而是取他義以成『借義對』。又如「雪含朝冥色，風引去來香。」（〈梅〉）中的「朝、冥」，「去、來」，各自為反義詞，在各句中構成「反義詞對」，同時上句「朝冥」與下句「去來」，又構成絕妙的『互對』。「奕奕彤闈下，煌煌紫禁隈。」（〈門〉）中的「奕奕」與「煌煌」，「郁郁高言表，森森幽澗陞。」（〈松〉）中的「郁郁」與「森森」均屬疊字成對的『連珠對』…等，信手拈來，隨處是對。凡此，足見李嶠《雜詠》使用對偶，種類之多，屬對之精切。

除了從詩歌範本習得作詩使用對偶之外，另外必備的常識便是熟記詩歌對偶的名目與例句，因此，如敦煌本《詩格》一類的著作也就成為學童必讀的詩學讀物。其中，對偶名目更是學童必須熟悉記誦的詩學內容。敦煌本 S.3011 及 P.3353《詩格》殘卷的存在，從側面透露出對偶論在唐代敦煌地區學童學習詩歌創作時實踐之一斑。



五、結語

敦煌文獻在千年前偶然的封閉，百年前偶然的發現。其中秘藏大量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實際使用流傳的各類文獻，提供後人瞭解敦煌地區民間社會生活的實物資料，同時也可據以印證唐五代社會生活與文化。所謂「以敦證唐，以唐考敦」，既提示了敦煌學研究要訣，也說明了敦煌文獻的研究價值。

敦煌文獻既大量，又多元；既複雜，又零碎，其價值除了文物、文字之外，更在文獻。文獻內容本身的正面價值外，有的還可從其保存情況考察其側面的文化價值。S.3011 及 P.3353V 有關《詩格》殘卷看是不起眼的雜寫，殘存內容不多，且見於傳世文獻，無益於唐代詩學理論之探究。然從側面觀察，卻可印證唐代學童習詩之歷程，以及考察對偶理論在唐人詩歌技法要求的實際情形，反映詩歌規範實踐的實況。雖然初盛唐所講的詩格，主要偏於粗淺的對偶，而就詩學理論言，對偶說只能算是一種粗淺的方法，是近體詩最基本的形式要求。敦煌寫本《詩格》殘卷的出現，透露了唐代律詩的成熟與普及，除了詩體發展的自然趨勢、帝王的提倡、科舉的影響等等原因外，《詩格》一類詩學著作對詩歌寫作之形式要求與技巧之講究以及示範詩之流通，可說是另外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專書

-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京都：大八洲出版，1948年）。
-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1年）。
-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3年）。
- 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東京：明治書院，1961年）。
-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 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 姜亮夫、陶秋英：《敦煌碎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台北：廣文書局，1967年）。
-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福田俊昭：《李嶠と雜詠詩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2月）。
- 鄭阿財：《空海文鏡秘府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76年）。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年）。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期刊論文

朱鳳玉：〈敦煌學即詩抄析論〉，《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8（臺中：東海大學文學院，2007 年 2 月），頁 111-138。後收錄於《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頁 1-30。

李尚、朱玉麒：〈新出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研究〉，原載《文物》2007 年第 2 期，修訂本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榮新江等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521-529 頁。

潘重規：〈文鏡秘府論研究發凡〉，劉百閔編《中日文化論集》（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 年），頁 1-24。

